

CLASSIC
现代学术
经典精读

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主编 孙玉文 邵永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丛书”之“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GUDAI HANYU JINGDIAN JINGDU

主编 孙玉文 邵永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依据古代汉语学科发展的脉络,精选《马氏文通》以来古代汉语主要研究方向的代表作三十余篇,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和训诂学、语法学等,并对每个研究方向的发展前景作了简要的点评分析,理出其间的主要发展线索。未选入的一些重要论著,也在点评和延伸阅读文献中给以适当的说明,有利于读者展开进一步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 孙玉文, 邵永海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9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
ISBN 978-7-04-044978-5

I. ①古… II. ①孙… ②邵… III. ①古汉语—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241号

策划编辑 王 丽 责任编辑 王 丽 封面设计 赵 阳 版式设计 赵 阳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田 甜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2
字 数 90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978-00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指》，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就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就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的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由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吞舟是漏、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绪 言

019 / 马建忠与《马氏文通序》

028 / 高本汉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绪论》

042 / 章炳麟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048 / 黄侃与《音略》

070 / 王国维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089 / 陈承泽与《国文法草创》

098 / 汪荣宝与《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 119 / 林语堂与《前汉方音区域考》
- 143 / 曾运乾与《喻母古读考》
- 163 / 李方桂与《〈切韵〉â的来源》
- 195 / 白涤洲与《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
- 226 / 罗常培与《〈中原音韵〉声类考》
- 248 / 魏建功与《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
- 278 / 杨树达与《诗“旨且有”解》
- 284 / 刘赅与《说文最初声母分列古本韵二十八部》
- 341 / 郭沫若与《卜辞通纂·序》
- 350 / 沈兼士与《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 382 / 丁声树与《释否定词“弗”“不”》
- 421 / 唐兰与《研究古文字的戒律》
- 426 / 王力与《中国语法中的系词》
- 447 / 陆志韦与《三四等与所谓“喻化”》
- 478 / 周祖谟与《〈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
- 491 / 吕叔湘与《相字偏指释例》

- 510 / 太田辰夫与《中国语历史文法·句末助词》
- 537 / 周法高与《中国古代语法·代词性助词·“所”》
- 562 / 于省吾与《释蠹》
- 565 / 朱德熙与《自指和转指》
- 599 / 赵振铎与《扬雄〈方言〉里的同源词》
- 624 / 郭锡良与《先秦语气词新探》
- 653 / 何乐士与《论“谓之”句和“之谓”句》
- 682 / 陆宗达、王宁与《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 705 / 裘锡圭与《汉字的性质》
- 721 / 郭在贻与《训诂学·训诂学的新领域》
- 742 / 唐作藩与《苏轼诗韵考》
- 766 / 薛凤生与《试论连词“而”字的语意与语法功能》
- 780 / 鲁国尧与《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 820 / 出版说明

绪 言

孙玉文

古代汉语，指有文献记载以来至清末以前的汉语。作为一门学科的古汉语，由传统小学发展而来。小学，本是古代对七八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少年实行初等教育的学校，西周已经出现。孩子们在小学里要认字，因此到汉代小学又转指文字学。字有形音义，需要对字形、字音、字义做专门研究，因此小学形成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分支学科；隋唐以后，人们用小学来总称文字、音韵、训诂这三门学问。在古代，小学主要为经学服务，但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从先秦开始，不断有人对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做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世界语言研究史上有崇高地位，早已彪炳世界语言学史册。

清代中后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清廷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所谓“天崩地裂”的亘古巨变。中华传统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完全处于守势；欧美文明连同近代科技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全面吞噬着传统文化。清末，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当时的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影响极大。1905年废科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传统小学难以作为以阅读古书为主要目的，特别是经学附庸而存在了。欧美学术思潮的猛烈激荡，使传统小学走上现代化道路，发展成为古代汉语学科，隶属于现代学科体系的语言学，从此古老学科绽放出时代新葩。虽历经坎坷，但经过海内外众

多学者的努力，这门学科有了新发展。

作为一门学科，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对，是一个历时的概念。它与传统小学在服务对象、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区别。古代汉语这门学科摆脱了主要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直接服务于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先秦两汉，而是涵盖有文字记载以来以迄清末，大约有3000多年历史的汉语；研究目的是探讨汉语言文字的共时和历时发展的规律，不局限于阅读古书；研究方法上除吸取传统小学的考证之法，主要是采取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系统。当然，在20世纪，古代汉语各个分支学科对传统小学研究成果的吸收程度不一。

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1898）是我国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第一部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现代语言学著作，问世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多年。这一百多年以来，现代语言学家对古代汉语的研究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丰硕成果，是我们今后研究古代汉语必须加以吸收的财富。

本书属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马氏文通》为起点，选取20世纪末以前国际范围内研究古代汉语的若干经典论著，简要地进行导读，希望对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的读者有帮助。篇幅有限，同时考虑到一个作者只选一篇文章、方便读者、分支学科相对平衡等因素，不少对古代汉语有深入研究的经典论著无法都选收进来，难免挂一漏万，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由于水平有限，也可能有分析不确的地方，敬希批评指正。

下面分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和训诂、语法学四个方面分别简述本书所选各篇的大致内容，以为读者阅读之助。

一 文字学

我国的文字学研究有悠久历史。《周礼·地官·保氏》谈到周代教国子以“六艺”，其中有“六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六书”的概念与此一脉相承。《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搜集整理并分析古文字（主要是小篆）形体结构，揭示汉字本义的字典，影响深远，研究《说文》成为专门学问；古文字之外的汉字研究，代有成果。清代研究文字学，成果多萃于《说文解字》，段玉裁有《说文解字注》，桂馥有《说文解字义证》，王筠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有《说文通训定声》，有人称他们为研究《说文》四大家，其研究成为继许慎之后

文字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

清末，发现了沉埋于河南安阳地下的商代甲骨文，这给文字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极大地促进了文字学的发展。人们看到了许慎没有看到的甲骨文，文字学界大开了眼光；见到了早于秦代小篆几百年到一二千年的古文字，对早期文字的沿革看得更清楚。浙江瑞安人孙诒让率先释读甲骨文，1904年撰成《契文举例》；1905年著《名原》，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和《说文》比较，考证古文字。虽然误释甚多，但孙氏的“筌路椎轮”（王国维语）之功不可磨灭，有些字的释读还是正确的。20世纪，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唐兰、于省吾等，在古文字考释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百年以来，历代文字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汉字史提上研究日程。海禁大开，使人们习惯于在世界文字体系、各种符号体系中分析汉字，对汉字本质特点的认识有了更多的视角，文字、音韵、训诂诸学的界限越来越分明，文字学学科体系化、理论色彩增加的趋势很明显。20世纪的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成果丰硕。

王国维1917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收入《观堂集林》卷九。《观堂集林》的版本情况，可参考中华书局1959年印行的《观堂集林》前的“出版说明”。本书所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根据的是商务本《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先交代王国维的研究过程，简述此项研究对于经史考证的作用；然后运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据殷商甲骨卜辞，以及《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等相关记载，对商人祖先夔、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唐（汤）、羊甲（阳甲）之名及这些人物的传说事迹做缜密的考证，兼释祖某、父某、兄某等名，证明《史记》所记录的殷商王朝世系的可信性，依卜辞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王氏正确地释读出甲骨文中的“王”“旬”等相当多的字；也有个别误释的字。“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的首创，对于矫正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疑古派”的流弊，起到积极作用，在学术界有深远影响。

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依余所怀抱之系统而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著录了一些原来“未经著录者”；分门别类解释重要的甲骨文，有拓片及考释，解决了一些文字的释读问题，1933年在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石印本。《卜辞通纂·序》是该书序言，对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介绍，所谈都是该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甲骨卜辞研究的重要贡献。文字考释虽不无失误处，

但成绩是主要的。

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是其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的讲义，撰于1934—1935年，由作者手写石印，随后出现了几种版本，也有改订本，但没有写完。关于《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可参考李荣《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介绍》（原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2期，后登载在李荣《语文论衡》一书中）。该书率先从理论上总结既往古文字研究经验和教训，建立古文字学系统。分上下二编，上编：（一）古文字学的范围和其历史；（二）文字的起源和其演变。下编：（一）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样去研究它；（二）一个古文字学者所应当研究的基本学科；（三）古文字的搜集和整理；（四）怎样去认识古文字；（五）研究古文字的戒律；（六）应用古文字学。书中归纳出考释古文字的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历史的考证这四种方法，至今还为人称道。《研究古文字的戒律》选自下编，文中针对古文字考释所提出的六条戒律，当时很有针对性，今天考释古文字也必须遵守。由于《研究古文字的戒律》是作为讲义的《古文字学导论》的一部分，因此唐兰对所提出的六条戒律还没有做深入分析。例如“戒偏守固执”和坚持正确的考释成果如何区分，什么是偏守固执，为什么要消除偏守固执，如何去消除偏守固执等，都没有展开分析，但是所提出的六戒无疑有积极意义。

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考释出相当多的甲骨文字，纠正以前一些误释；书前的《甲骨文字释林序》结合此前古文字考释在方法论上出现的偏差，对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做了提纲挈领的科学总结。《释霤》最早收录于作者1943年出版的《双剑谿殷契研枝》三编，经改编收录于《甲骨文字释林》上卷。本书所选《释霤》录自《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的“𩇛”字，据“七日壬申𩇛，辛子雨，壬午亦雨”等例句，无疑是表天象的动词。王襄、罗振玉释为“電”，叶玉森做了有力批驳。但叶氏释为“雹”，郭沫若释为“虹”，董作宾释为“霰”，陈梦家释为“𩇛”（即躋字），在字形结构上无法讲通，难以成立。《释霤》一文撰之甲骨文文例，敏锐地将“𩇛”字的形体分析跟其他古文字联系起来，正确释读为“霤”，还验之于卜辞，考虑到语境对文字考释的影响。文章虽短，但方法科学，结论有说服力。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十一“霤”下按语：“契文𩇛、𩇛、𩇛、𩇛，诸家说者纷纭，释電、释雹、释霰，于字形均远……于氏释霤，于契文、金文、小篆形体衍变之迹的然明白，以读诸辞亦怡然理顺。许书古文有作𩇛者，下从00，犹存契文遗意，于氏说不可易也。”并且还有理有据地从其他方面批评郭沫若、

陈梦家的说法，其中对陈氏的批评很中肯，他以为陈说“于卜辞辞义亦不尽谐适”。李氏的这些总结甚有依据。

裘锡圭《汉字的性质》原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修改后收入《裘锡圭自选集》。汉字的性质需要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前人已有不少成果。裘锡圭采取新视角，区分记录语言的符号和汉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将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叫“字符”。他认为世界上各种成熟的文字都记录语言，要探讨文字的性质，只有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来区分为不同类型。各种字符，可据它跟所记录的词意义上有无联系分三种：意义上有联系的是意符，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基本上使用意符和音符，此时汉字的性质可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后来则意符、音符、记号都使用，可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看，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有些字只跟语素这个层次有联系，有些字则起音节符号的作用。汉字的性质还远远没有认识清楚，裘锡圭的《汉字的性质》无疑将人们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 音韵学

东汉创造了反切注音方法，三国魏李登作《声类》，是我国第一部韵书，至此汉语音韵学开始了。音韵学起先是研究魏晋以降的中古音，南北朝至隋唐，韵书大量出现。后来，音韵学扩大了范围。古代，音韵学分为三支：一今音学，研究《切韵》系韵书为代表的中古音；二古音学，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这门学科从清代开始进入科学系统的研究领域；三等韵学，是古代对汉语语音进行分析的学问，唐宋时期已经出现。古人对这三门分支学科做分析研究，取得极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小学的发展。

进入现代语言学时期，受欧美语音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浸润，汉语音韵学界语音分析的能力和对音变规律的认识能力明显提高，越来越注重用音标来研究字音；“史”的观念更加明确，全面研究历代音系，掌握其间的沿革，探索其共时和历时规律成为自觉追求。百年来，汉语音韵学研究者十分注重吸收中国古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将历史文献的科学考证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有机结合，发展出汉语语音史这一学科，发展出汉语语音史不同的研究模式，成就斐然。王力的《汉语史稿》（上册）、《汉语语音史》通过大量研究，提供了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两个框架，影响深远。

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908年刊登在《国粹学报》第五号上，后作为《国故论衡》（1910年日本初版，后在国内有多个版本。这里以浙江图书馆的《章氏丛书》本为底本）上卷“小学十一篇”中的第六篇。论证中古三十六字母的泥娘日三个声母上古都要合并成泥母，用到的材料有谐声字、声训、异文、异体字、假借、读若、直音、同源字、现代方言等，很有说服力。缺点在于章氏的说法只能解释部分内证材料，没有解决分化的条件问题：例如日母往往跟日母构成双声联绵词；娘母和日母都拼三等，如果日娘上古同声母，则“让”“酿”这一类字就同音，后代没有分化的条件。

高本汉（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的《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phonologie chinoise*）之前，已有西方学者对汉语古音进行构拟，但不成功。《中国音韵学研究》较为充分地吸收中国学者《切韵》音系音类研究成果，进行音值构拟，取得成功。全书除“绪论”，还分《古代汉语》《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历史上的研究》《方音字汇》四卷，于1915—1926年分四册出版。这是利用历史比较法全面科学构拟汉语中古音，研究《切韵》到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系统演变的第一部著作。不足之处是对古代反映中古音类的资料掌握得不全面，所用反切从《康熙字典》中撷取；对现代方言材料的运用详于北方而略于南方。这影响了高氏部分结论的科学性，但开创之功不可忽视。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力《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全面介绍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声韵母构拟；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了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的研究成果在汉语音韵学界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绪论”部分提出研究汉语的课题：（1）考证中国语言的祖先跟来源；（2）弄清楚这个语言的历史；（3）考明白现代中国语言的各方面。指出先要完成（2）、（3）两项工作，才能做前面（1）这项工作。高本汉先总结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语古音构拟、现代汉语各方言研究的得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1）把《切韵》音系构拟出来，以此作为系统的现代方言研究的起点；（2）对现代汉语方音做科学的描写；（3）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音是怎样从中古演变来的。他谈到了构拟中古音的方法：“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工夫使它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就是在每一个方言必得能找出同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得成可能的变化。”高本汉在“绪论”部分所论对了解《中国音韵学研

究》一书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黄侃的《音略》1920年登载在《国学卮林》第一卷第一期，此前在社会上有过流传。分为：（1）略例，概述了黄侃研究古今音系统的总结论、创新之处以及学术来源；（2）今声，先比较《广韵》四十一声类和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异同，再列出四十一声类，假定其古音值，据此正今官音之误；（3）古声，简述黄侃声母系统的继承和创新，列出他的上古音十九纽，结合本韵、变韵、本声、变声的理论，简要说明与中古声类的发展变化关系；（4）今韵，叙述了黄侃对《广韵》韵母系统的总看法，表列《广韵》的韵母系统；（5）古韵，简述了黄侃古韵部系统的继承和创新，列出他的上古二十八部系统，分开合洪细，指出哪个韵是本韵；（6）反切，简要叙述反切的原理。黄侃在古韵研究上最大贡献是重申了戴震的阴阳入三分；在声母上提出照系二等归精系、照系三等归端系，能解释部分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有说服力，但难以解释所有内证材料，也没有解决好语音分化问题。他试图将声韵母结合起来解释古音他的系统，但在解释上陷入循环论证。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1923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是中国学者第一篇考证古音值演变的文章。汪氏看出汉字不直接记录音值，但与汉语有交往历史的语言有的在历史上用过表音文字，因此可以传入国外的汉语译音、传入国内的外语的汉字译音，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对音材料，来研究各期的音值及其演变。他试图论证：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汪氏的材料和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利用古代音类的研究成果，以歌戈鱼虞模等古韵为基础，结合记录音值的材料看它们的演变，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林语堂的《前汉方音区域考》1927年登载在《贡献》杂志第2~3期上，后收入他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语言学论丛》。林氏是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古代汉语方言的第一人，极为重视时代观和地域观，《前汉方音区域考》是他这一思想的实践。文章利用扬雄《方言》考察西汉方音区域划分，探讨如何利用《方言》考察西汉方音区域，利用《方言》书中两地名并举的次数来确定两地方言的亲疏程度；提出了初步的分区意见，分书中地名二十六类归并为西汉方言十四种；论述各方音区域的远近关系。由此揭示出西汉方言的大势，具有很大的创新性。

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1928年刊登在《东北大学季刊》第2期上，是曾氏古声母研究的代表作。文章吸收陈澧《切韵考》中古音的研究成果，将三十六字母的

喻母分为于母（喻三）和喻母（喻四）两类，通过异文、同源字、异体字、双声字、声训、读若、异读、假借等早期材料，论证“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喻、于二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归匣母完全可以成立，曾氏也注意到《广韵》“雄”注成于母而《集韵》和《七音略》《韵镜》归匣母的例子，可惜太少。中古匣母拼一二四等，于母拼三等，正好互补；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一文论证，中古材料中，匣母和于母还有大量交涉。喻母归定母，也很有见地，但是难以解释所有内证材料，也没有解决好语音分化问题，因此具体细节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李方桂的《〈切韵〉â的来源》发表在1931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册。文章通过《诗经》押韵和上古谐声字所反映的韵部情况，与高本汉所构拟的《切韵》韵母做比较，运用内部构拟法，为上古汉语部分韵部构拟â和ə两个元音，中古的â分别来自这两个元音；还批评高本汉上古汉语一部多主元音的构拟，极有价值。该文采用了上古韵部和中古音音类研究的成果，吸收了高本汉中古韵母构拟，注意音节结构的影响，研究其间的语音系统对应关系，给上古构拟â和ə两个元音，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上古到中古的语音演变。这是汉语上古音构拟方面的新尝试，极具启发性。

白涤洲的《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最初作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报告之一，刊于1931年的《女子师范大学学术季刊》第2卷第2期。白氏认为前人分析声纽韵类在方法上尚有未尽之处，“于他们所采方法之外，还有一统计方法，虽然比较呆板，却是容易正确”，于是将统计法全面引入《广韵》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声纽统计方面，陈澧《切韵考》通过系联得出《广韵》四十声类，明微、疑母等均只有一类，曾运乾区分了声的洪细与音的鼻侈，分出五十一类；白氏据统计法归并得出四十七母（实际为声类）。韵类统计方面，白氏据统计法，得出《广韵》共有二百九十韵类。白涤洲对《广韵》声类的统计很出色，其结论基本为学界所公认。

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年登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册上。《中原音韵》是近古汉语北方话语音系统的代表，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原音韵〉声类考》吸取日本学者石山福治《考定中原音韵》在研究《中原音韵》声类研究上的经验教训，在国内率先对《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进行研究，密切结合《中原音韵》的体例，比较等韵和三十六字母，创“归纳法”，考订出20个声母，为《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研究方向、科学的研